

科学处与新中国早期的科学领导工作 (1951~1956年)

张 藜

赵 涛

(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 要 科学处(1951~1966年)是中宣部下设的一个职能机构,它在中共中央党务系统内负责科学领域事务,对新中国早期(1951~1956年)的科学领导工作拥有广泛的影响。科学处的成立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宣部自身管理领域扩大和调整的产物,目的在于强化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由于其中宣部的背景,科学处实际承担了一部分对科学工作如对科学院的“日常”行政和管理职能,成为党领导科学工作的重要管道。此外,科学处还参与了科学政策事件和知识分子政策事件的处理,在某些知识分子政策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一些科学工作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科学处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新中国党领导科学、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当代科学史 科学处 中宣部 中国科学院 科学领导工作 于光远 龚育之

中图分类号 N092:P62-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441(2015)04-0385-13

科学处(1951~1966年)是设在中宣部下的一个职能机构,在中共中央(以下简称“中央”)党务系统内负责科学领导工作。在1956年之前,它同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共同构成了“党领导科学工作”的布局。由于科学院难以兼顾科研和行政管理的双重任务,1951~1956年科学处在领导科学工作上拥有广泛的影响。1956年,为进行全国科技规划任务,中央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1958年两机构又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更高级别的中央科学领导小组,新的科学领导体制得以建立,中宣部科学处的重要性开始下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宣部被作为“阎王殿”打倒,科学处也随之停止运作。“文革”结束后,中央重建中宣部,但不再有科学处的建制。

自上世纪90年代始,一些学者陆续对中宣部、科学处的部分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积

收稿日期:2015-07-21; 修回日期:2015-09-26

作者简介:张藜,女,1966年生,云南昆明人,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科学史;赵涛,1982年生,山西平定人,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后。

累了一批珍贵的口述资料,有的科学处成员也撰写了相关的回忆文章。历史信息的披露使得原本不为人知的科学处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有学者也开始对科学处的历史进行研究。郑丹在博士论文《在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宣部科学处(1951~1966)研究》^[1](以下简称“郑文”)中认为:科学处是执政党对自然科学进行意识形态治理的机构,它通过主导自然科学批判完成科学领域旧的意识形态的去魅,建立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的新规则;借助科技方针政策的制订实现意识形态的“政策化”;同时将自然辩证法作为意识形态治理的学术支撑,从而将执政党的意志输入到自然科学领域,形成对科学工作的领导。郑文的视角属于政治对科学作用的范畴,从历史事实来看,新中国早期过多政治因素确实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郑文却未对其文章的核心概念——“意识形态”作规范的定义以及适用范围等方面的处理。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是一个内涵与外延极为复杂的“概念”,通常我们本身对其也是充满“意识形态”地加以使用,许多时候反而丧失了它本应具有的意义。在郑文中,许多政治因素都被视为“意识形态”化的,显然有以偏代全之嫌,仅举一例,1954~1955年,科学处参与的中央对卫生部门中西医政策的批判自然是意识形态部门介入了专业领域的冲突,但它的缘起却是对之前过于以意识形态因素划分中西医的政治纠偏,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只是当时政治环境的一种表象而已,将科学处的这种行为称为“意识形态”治理显然并不合适,相反更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其次,科学处是一个执行中央政策的部门,他们参与的许多事件体现的是高层政治的意志,郑文将这些事件归入科学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文章提到的“借助科技方针政策的制订实现意识形态的‘政策化’”([1] 65页),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科技政策的制定是一种国家行为,远非科学处所能承担,有些事件尽管意义重大,但科学处的作用可能很小。此外,有关科学处的资料主要是口述史料,准确性和客观性难免有所出入,同时相关档案资料也未开放,使得一些史实还无法准确揭示,这也是目前研究尚难以避免的问题。

由于亲历者和研究者已对科学处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介绍,本文并不打算全面考察科学处的历史,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读相关的口述资料并参考其他史料,选取科学处对科学领导工作影响较大的前期阶段(1951~1956年),对科学处的一些史实问题、实际职能、在某些历史事件中的作用等方面做一些探讨。

1 科学(卫生)处的成立和调整:建立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

中宣部是中央直属的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在其大部分的历史中,它并不负责自然科学领域的工作。中宣部与自然科学工作发生关联是在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的不断胜利,有关建国和新政权筹备的各项事宜也随之展开。在科学领域,中央考虑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一个全国最高科学机构,由郭沫若负责。6月中旬,中央决定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负责筹备建立科学院。将此任务交由党的宣传部长来执行,缘于当时人们通常将“科学”和“文化”联在一起,而文化工作在党内则归属于中宣部,因此由陆定一来负责科学院的筹划工作也是顺理成章之举。^[2]除了这种特定的时代认识因素外,构设中的科学院是一个囊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机构,而中央有意由中宣部来领导社会科学部分。^[3]也就是说,陆定一负责筹备科学

院,还有中央要直接领导社会科学方面的因素。新中国建立后,政务院设立了文化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委”),郭沫若为主任,陆定一为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担任秘书长,实际工作由陆定一主持负责^①。^[2]而科学院正是文委指导工作的一个部门。这样,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不仅领导了科学院的筹建工作,也通过文委这一机构肩负科学院的行政指导与管理职能。不过,在中宣部内部,并没有相应的部门负责科学院或其他自然科学领域。根据龚育之的回忆,“开始中宣部没有管科学方面的很多事,也许部长管一点,但部里没有相应的机构。”([5],206页)“也许部长管一点”正是指陆定一负责筹建科学院并主持文委的情况^②。很显然,中宣部领导通过文委来参与对科学工作的领导。

中宣部通过部级领导和科学工作发生关联的情形持续时间并不长。1951年11月15日,中宣部、文委党组关于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向中央请示报告。次日,毛泽东就给胡乔木作了批示,“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6]由于无法看到档案原件,请示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笔者推测正是在这一报告中,中宣部和文委提出了设置科学卫生处。根据于光远的回忆,1951年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胡乔木向其提出“科学也是中宣部管的一个领域”([7]2页),“应该管科学院的工作”([7]2页),在正式机构成立之前,暂时由中宣部理论教育处负责。为此,时任理论教育处处长的于光远便开始了挑选干部等准备工作。至于成立时间,于光远回忆“大概在1952年成立了科学卫生处”([7]3页)。在科学卫生处成立之前即已进入中宣部工作的何祚庥则回忆说,“中宣部科学处成立于1951年年底,11月或12月。”([8]1页)根据后来的访谈,何祚庥又将成立时间确立为“1951年12月”^③。综合这些信息,笔者认为科学卫生处无论成立于1951年年底还是1952年初,它都与11月15日的报告有直接渊源,而从毛泽东迅速的批复来看,也说明了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因此何祚庥的说法相对而言可能更接近史实。

顾名思义,科学卫生处是负责科学和卫生方面的工作。从组织结构来看,中宣部和文委是指导相同业务领域的对应的党、政机构。文委在行政方面负责指导卫生、科学事务,“而中宣部从党的角度也要建立管理科学卫生的机构。”([5],206页)可以说,正是文委确定的职能扩大了中宣部的管理职能。中宣部成立科学卫生处管理科学、卫生工作,是中央成为执政党后它自身权力扩展的一个体现。为符合党政对应的原则,文委也设置了科学卫生处,不过发挥重要作用的在中宣部这边^④。

将科学和卫生工作放在一起管理看起来颇为奇怪。除了当时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外,缺乏合适的干部也是重要原因,一个直观的体现就是科学卫生处的几任负责人均由外行

① 此外,陆定一外孙荒坪回忆,文委的许多实际事务都是由陆定一来抓^[4]。

② 除了陆定一外,另一个对科学工作有重要影响的中宣部领导是胡乔木。胡乔木不仅是文委秘书长,更重要的是还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是中央掌握文教系统的枢纽和关键。

③ 根据刘立、熊卫民等人2014年5月9日对何祚庥先生的访谈,在此感谢熊卫民先生提供参考资料。

④ 关于中宣部科学处和文委科学处两单位关系的问题,曾同时是这两个机构成员的何祚庥回忆说:当时的副处长赵润则同时负责两边,但“中央宣传部的人可到文委兼职,而文委的人,却多为新参加工作的非党同志,并非中央宣传部的人员。在赵润的眼中,他们只是一般的工作人员,而何祚庥是参加革命较早的地下党员,又懂得一些科学知识,所以大事小事都交给我去干。”([9]95页)根据此说,两个机构之间还不完全是真正的合署办公,中宣部在其中可能发挥更大的权重。

来充任^①,他们对科学工作也缺乏兴趣,更关注自己熟悉的领域。科学处领导工作不得不由胡乔木等部级领导来指导进行。([5],208页)事实上,较早进入中宣部工作的于光远、何祚庥等人开始也并不愿意离开原来熟悉的岗位到科学卫生处工作。([5],208页; [8]7页)这些情况说明,科学卫生处还处于一种初创状态。

1954年,科学卫生处由外行干部领导,而负责人又实际不在位的情况有所改变。4月27日,中央决定撤销大区级党政机构,各省党委、政府直接对中央负责。^[10]据此,中央和地方机构的相关职能机构都有一个大的调整。5月19日,中宣部就关于大区机构撤销后中央宣传文教机构分工和干部配备问题向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组部部长邓小平及刘少奇报告,指出中宣部现有的组织机构和干部力量不能适应大区撤消后的实际需要,并提出两套方案供中央选择,在两套方案中均有“科学处”这一机构设置。5月27日,邓小平批示“拟予原则同意”,之后刘少奇也表示同意。^[11]这样科学处在中宣部内单独建制^②。改革后的科学处既管理自然科学也管理社会科学领域,组内分自然科学组和社会科学组。而负责人也进行了调整,由中宣部副秘书长胡绳兼任处长,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于光远任副处长。^③同时还补充了一批工作人员。胡绳兼任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任副处长的搭配时间并不长。1955年1月1日,中宣部各处副处长都转为处长,于光远在此次调整中转任科学处处长。科学处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即“于光远时期”([7]6页)。

1954年的裁撤大区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行政体制改革,它是中央集权的重要举措,如果说科学卫生处的成立是党政组织结构调整和中宣部自身权力领域的一种扩展,由科学卫生处改为科学处则是中宣部利用中央政府集权的机会进一步将此权力规范和细化。从当时党和国家领导科学工作的格局来看,科学处正是依托中宣部这一重要的机构来发挥作用,而中宣部则通过科学处扩大和规范了它在科学领域的影响。

2 作为行使“日常权力”的科学处:以对科学院的“领导”为例

科学处既非行政部门,又非专业性的领导机构,在当时“党领导科学工作”的格局中,是一个发挥“实际影响力”的机构。这是我们考察科学处如何“领导”科学工作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而这种“实际影响力”的体现,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审视,一方面是从其日常状态即科学处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另一方面从各种历史“事件”中看科学处的角色。

先来看日常状态的科学处。根据科学处同人的说法,他们是按自己的专业背景,分别联系不同的科学领域^④。黄青禾说,“科学处的工作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上面交

① 科学卫生处第一任(1951~1952年)负责人为赵沅(音乐家)继(1953~1954年)为秦川(文学家)。

② 原科学卫生处中的“卫生”部分此时并未同科学处一样形成单列建制,相关工作仍暂由科学处来负责。1956年卫生体育处成立,卫生工作正式从科学处剥离出去。([7]4页)

③ 当时中宣部各处一般没有正处长,只有副处长,之前的赵沅、秦川任职也都如此,由部级领导胡绳任科学处处长是个例外。同时于光远还兼任理论处副处长。([7]4页)

④ 龚育之、孟庆哲、李佩珊等联系科学院和一些大学;黄青禾与黄舜娥负责联系农口的研究所和大学;孟庆哲联系科联、科普方面的事宜;俞康金负责冶金、化工方面;马志瑞主要联系地理方面。此外,在卫生体育处成立之前李佩珊还负责中医政策。龚育之还负责联系《科学通报》。可以看出,科学处所涉及的科学领域是相当广泛的。

办的;……另一类工作是自己找的。”^[12]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处是一个调查、研究机构。但这并不能反映它的真正地位。科学处的工作人员可以参加所联系部门的党组会。为避免对相关部门的工作造成干扰,胡乔木禁止与会的工作人员发言([7]5页)。这恰说明依托中宣部的科学处影响力很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科学处对科学院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院作为政务院组成部门,负责国家科学领导的行政职能。不过科学院同时承担行政和科研的重任,尤其在计划、指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故多次向中央提出要另设专职的主管国家科学事业的政府机构,但均未结果([13],14~15页)。直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政府机构进行了新的调整,科学院不再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而承担行政职能。^[14]原先指导科学院工作的文委也撤销,但中央并没有设立相应的部委来行使全国科学管理的职能。直到1956年,国家为编制十二年科学规划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之后又转为常设协调机构,同年还成立了国家技术委员会,形成科学与技术分别管理的格局。1958年,两机构合并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更高级别的中央科学领导小组也设立,新中国科学领导行政体制方得以最终确立。此外,受困于组织、体制等因素,尤其是院中党的领导力量薄弱,科学院自身的发展也颇受限制。([13],16页)科学院建立后,虽有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兼任副院长,但其基本不问院事。([7],7~8页)恽子强党组和张稼夫党组也无法驾驭庞大的科学院系统。([5]205页;[7],15页)科学院甚至在本身所属研究机构的学术领导方面都难以胜任。^[15]这种情形一直到1956年中央决定充实科学院领导力量才有所改变。

科学处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科学处同人认为:以1956年为界,前期科学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期的重要性则明显下降。([5]210~211页)尤其在1954年之前,科学院勉为其难承担行政领导重任,1954至1956年主管科学的国家机构又付之阙如,因此科学处对科学院的“领导”主要集中在1956年之前。

事实上,科学卫生处的建立也是缘起于胡乔木提出“应该管科学院的工作”([7]2页)。但科学处和科学院并没有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科学处“领导”科学院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1952年初,中宣部部长、文委副主任陆定一批评了当时科学院刊物《科学通报》存在的一些问题,何祚庥敏锐地注意到了陆定一的态度,随后何祚庥向他的清华校友龚育之提议撰文批评《科学通报》存在的问题。^①龚育之的当时尚未大学毕业,但他的文章得到了赵泐和陆定一的认可,很快在《人民日报》(1952年1月10日)上发表。([8]3~4页)龚文见报后,引起科学院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副院长竺可桢与院长郭沫若商议对策,决计改变编辑方针。([17]538~539页)之后竺可桢登门看望在家养病的龚育之,并邀请其担任《科学通报》的专职编辑。([17]540页)郭沫若还亲自起草《编者的自我

^① 根据何祚庥的回忆([16]72~73页)。2014年5月9日,刘立、熊卫民等人就科学处对何祚庥进行的一次访谈中,何祚庥又提到陆定一是在私下里同何祚庥提出《科学通报》存在的问题,并非在正式场合。实际上,1952年1月4日,陆定一和李富春在政务会议上对《科学通报》提出了要求,陆定一认为该报“应配合思想改造,过去只有介绍科学,以后应有斗争精神。”([17]539页)李富春提出要将科学院思想改造经过介绍给全国([17]539页),但在龚育之《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发表前,科学院并未有对陆定一、李富春的要求有所回应。

检讨》,以示《科学通报》接受批评。借此科学处介入了对该报的审核,龚育之和何祚庥在1952年负责该报的选题、组稿等重要工作,原编辑只是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18] 6页)

科学处成立时正值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科学处负责主持科学院方面科学家们检讨材料的审查和思想谈话,赵汎为负责人,何祚庥为东区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委员。在陆定一、胡乔木的指示下,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不仅启动很晚,与高校相比力度也大为缓和。([7] 9~11页; [8] 15~18页) 物理学家吴有训因害怕“历史问题”被揭发而有自杀的倾向,此事虽被科学院党组获悉,但他们无法直接向上面反映,后通过科学处的何祚庥汇报陆定一后,陆定一及时安抚方避免了悲剧的发生。^① 胡乔木则指示龚育之支持和保护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汪堃仁的研究。([7] 10页) 由于科学处成员经常参加一些部门的党组会议,尽管中宣部有“禁言”的指示,但在一些问题上,他们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如在一次北京、上海、东北的科学院系统党组联系会议上,来自华东的李亚农对自己的批评不满而发牢骚,使得会议气氛发生变化,科学处成员向赵汎汇报并经其同意后,在会上纠正了李亚农的这种行为,此事令与会者印象深刻。([8] 5页)

代科学院起草报告和文件是科学处的一项重要工作。1952年9月,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丁瓚在北京地区所长联系会议上做了《关于制定科学工作计划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此报告主要是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指导原则进行科研规划,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953年科学院工作安排。该报告是由科学处主导起草的,核心思想是科研计划要同国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8] 7~8页; [19] 30页) 1953年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②,回国后院党组向中央提交了访苏报告。科学处为中央起草对这一报告的批示,这是中共中央第一个专门针对科学和科学家工作的政策性文件,影响很大。为配合宣传科学院访苏活动,《人民日报》配合发表了社论《发展科学事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该社论原由科学院起草,但是因无法反映中央批示的精神,而改由科学处接手完成。([5] 217页) 科学院一些重要文件或报告需要科学处主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院党的领导力量十分薄弱,时常无法有力地贯彻中央精神。恽子强、丁瓚等人起草的报告经常是在胡乔木、赵汎、何祚庥等人进行大的修改后方可上报。([20] 8页)

科学院学术、科研方面的重要问题也是科学处重点参与的领域。1955年,科学院建立学部制度,科学处参与了院章的起草,在决定学部委员的人选方面也拥有很大话语权,自然科学学部委员的名单要经过科学处的审核。([7] 11~13页) 设立新的研究机构属于行政事务,一般由国务院(文委)决定,但有时科学处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52年,植物学家秦仁昌向何祚庥提出应在昆明设立一个植物研究所,何祚庥向陆定一报告并得到了批准,次年科学院就成立了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即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20] 36页) 心理研究所由院党组副书记丁瓚向陆定一建议而设立(1951年),但由于当

① 刘立、熊卫民等人2014年5月9日对何祚庥先生的访谈。据《竺可桢日记》记载,吴有训确实“因思想改造,几次欲悬梁自尽”([17] 596页)。

② 根据何祚庥的描述,他是受胡乔木派遣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此次代表团,但明确否认为代表团成员。有关何祚庥在此代表团中的身份目前在文献中尚未找到确切的记载,但是这对本文此处讨论代表团回国后起草文件的问题无影响。

时反对声音较大,科学卫生处保持了对心理所动向的关注。1952年初,心理研究所向文委汇报研究计划,科学卫生处就其科研计划从研究的目的、方法、内容等方面给出了详细的否定意见,批评该所计划脱离实际、脱离政治,受到了资产阶级心理学研究的影响。陆定一根据科学卫生处的意见还同所负责人曹日昌谈话,责成其进行整改。([13] 217页)科学卫生处之后还将其他科学家的反对意见反馈到中宣部和文委,1953年心理所最终降格为研究室。([20] 38~39页)

一方面是科学处积极介入到科学院事务;另一方面,科学家和科学院对科学处也相当尊重 and 认可,“他们也愿意找我们,因为觉得我们更便于向上面反映情况。那时候党的威望很高,我们出去大家都愿意把情况提供给我们,科学家都热忱接待,不管找到谁,……”([8] 6~7页)科学院党组则将科学处视为上级。20世纪80年代,张稼夫曾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对于光远说,“你是科学院的老上级”,而于光远也认同这一说法,“张稼夫时代党组是把我们将成上级看待的,很尊重我们的意见。”([7] 6页)何祚庥则说,“那时科学院党组的工作大小事情都请示中宣部。”([8] 20页)

值得注意的是,中宣部的领导同时也是文委的负责人,科学院的许多工作也多向陆定一、胡乔木汇报。而陆定一、胡乔木则又通过科学处作出回复,何祚庥的说法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关系,“科学院和中宣部往来很密切,大事、小事恽子强、丁瓚都要请示乔木,乔木下达到赵泓,赵泓下达到我,我老是跑腿,做了好多调查研究。”([8] 7页)张稼夫也说,“从党内系统来说,科学院属于中宣部直接领导。具体和我们联系的是中宣部科学处。科学院的一切重大的决策,都事先通过中宣部传达给我们,再通过院党组在全院贯彻执行。”^[21]显然对于党的领导,科学院是相当重视的,郭沫若曾特意交代钱三强科学院的工作要经常和胡乔木交流。^[22]

在“领导”科学院这个例子中,科学处是中宣部的权力管道。我们可以看出,通过科学处,中宣部在人事、思想政治、党组工作、机构设置等诸多事务方面指导了科学院相关工作的展开。尽管没有最终的决策权力,但科学处是作为中宣部的末梢而执行一种日常管理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确是科学院的“上级”。

3 政治与科学: 在“历史事件”中的科学处

在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科学工作也毫不例外地受到政治的影响,作为联系科学领域的党务部门,科学处是政治—科学张力场中的一个关键环节。黄青禾所言的“上面交办的”([12] 71页)工作,即是科学处在政治—科学张力场中参与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

在科学处同人的口述回忆中,他们的叙述也通常是围绕历史事件而展开的,主要有:

批判乐天宇事件(1952年);

起草《中央对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1954年);

批判王斌医学思想(1954年);

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1955年);

参与制定《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1956年);

参加“青岛遗传学会议”(1956年);

起草《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1961年)。

这些标志性事件对新中国科学的发展影响重大,同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均为秉承政治意志发展而成。从发生的时间来看,除了制定《科学十四条》外,其他均发生在1956年之前,这和科学处充当科学院的“上级”的时间段基本重合,很显然在这一时期科学处发挥的作用更大。一方面,虽然科学处在这些历史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是唯一的参与者且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这些事件尽管由政治意志生成,但这种政治意志的成分和来源并非一致。从这两个角度出发,科学处所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地位与作用大体可以为两类:一类包括起草《中央对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参与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起草《科学十四条》;一类包括批判乐天宇事件、批判王斌医学思想、梁思成建筑思想批判、参与组织“青岛遗传学会议”。前者可以称为是科学政策事件,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在科学领域的政策化;后者可称为是涉及知识分子政策的事件,呈现的是政治与科学的某种张力。

关于科学政策事件,通常是国家基于需求制定或调整政策而引发,虽受泛政治化的影响,更多地是针对科学事业本身,是全局性的发展科学的部署。《中央对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在科技方面的奠基性文件,全面阐述了国家发展科学事业的基本政策。([19] 41页) 《十二年科学规划》是新中国第一个发展科技的远景规划。《科学十四条》是对受政治运动干扰严重的科技工作进行调整的政策性文件。这些都对新中国科学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这类事件中,科学处是按照国家统筹部署参与其中,对事件本身并无实质的影响,但在不同时期科学处作用的大小也有所区别。对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基本上由科学处主持起草。([5] 217页) 《十二年科学规划》中于光远主导了自然辩证法发展规划的制定^[23],还向周恩来反映科学家提出的“对理论研究注意不够”问题([7] 14页)。至《科学十四条》时,科学处仅仅是起草文字,即所谓参与“笔政”而已([18] 19~20页)。从这三个事件中,可以看出科学处在国家科学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一个趋弱的走向。

涉及知识分子政策的事件则有所不同,它一般发生在局部科学领域,由高层将政治意志输入该科学领域而形成,通常有具体的科学家(知识分子)成为作用对象,其结果对科学家本人命运和相关科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共和国成立后,高层政治干预科学发展的例子比比皆是,相当一部分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有研究者将这种情形称为是“高端权力”对科学事务的“非理性”介入。([13] 225页)但在科学处参与的这几个例子中,我们须将事件的起因和结果做出区别,再来评估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张力而是否将其定义为“非理性”介入。另外,科学受政治影响和高端权力直接介入是两个维度的问题。如在全盘学习苏联的氛围中,科学家可能对欧美科学进展不予(敢)关注,这是科学受到了政治环境的左右;若高层领导人直接干预某位科学家的研究或发表导向性言论,就变成了高端权力的直接介入。在批判乐天宇事件中,受苏联科学的影响,乐天宇是坚定的米丘林主义者,在反对摩尔根学说方面也不遗余力,这同当时特殊的向苏联学习的政治气候相关。但乐天宇利用自己的职权禁止其他人研究、讲授摩尔根遗传学课程,导致了遗传学家李景均

的出走,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5] 213 页) 相关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指示要严肃处理。^[24] 对王斌的批判源自于王斌轻视中医的思想,他视中医为封建医,主张应随封建社会一起消灭^[25],还导致了卫生政策的走样,从而引起毛泽东的不满。^① 青岛遗传学会议的召开是因长期以来在遗传学领域中存在大力宣传、推行“李森科学派”学说,同时批判、禁止研究“摩尔根学派”学说的不正常现象,导致了对多名科学家的错误批判,产生了非常消极负面的影响。^② 毛泽东在提出“双百方针”时即举了遗传学领域存在的问题。^[29] 他还要求相关部门解决此问题。^[30] 会议本身也是为落实“双百方针”而开。在这三个事件中,科学工作受政治环境的影响而走向极端,高层政治的介入意图是解决相关领域存在的问题,而非对科学事务的无端干涉。在梁思成的例子中情况有所不同,梁因提出维护北京历史名城的原有风貌、反对拆除古建筑,被批为“建筑学中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对梁的批判是毛泽东授意陆定一,陆转而委托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来负责。([16] 75~77 页) 相对于之前几个例子,高层直接干预并政治界定了本属于学术研究范围的科学家的工作,大体属于“高端权力”对科学事务的“非理性”介入。

在这几个例子中,科学处根据高层的指示进入了相关事件,但是在不同的事件中,科学处的作用和影响也不尽相同。1954年龚育之发表内部文章对王斌的医学思想进行批判后^[31],“各地出版的党刊纷纷加以转载”,影响颇大。^[32] 次年,龚育之和李佩珊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将此前的批判提升了一个强度,“各地报纸和卫生部门的许多刊物都发表和转载了这方面的文章”^[33]。科学处参与批判王斌医学思想时,中央已对卫生部领导人和中医政策进行了调整,科学处主要是从理论层面纠偏王斌的错误观点。在青岛遗传学会议中,科学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调查研究工作”([28] 203 页)。据此,孟庆哲、黄青禾、黄舜娥向会议提供了一份《关于米丘林生物学与孟德尔、摩尔根主要论争的一些材料》,其中黄青禾负责的“关于苏联生物学界两派论争历史”部分,揭示了李森科借助政治力量干扰学术的反科学一面,引起了极大的震动。([28] 203~204 页) 于光远在会议上对“百家争鸣”进行了阐释,提出“党对学术问题不做决议”、“学术研究自由”等观点,对破解教条主义、引导科学家发言起了积极作用。^[34] 在这两个案例中,科学处通过深入的调查和细致的研究,不仅贯彻了高层的政治意图,也为解决矛盾提供了助力,同时还得到了相关领域科学家的接受和支持。参与批判王斌的龚育之认为,虽然避免不了一些“上纲上线”和“戴帽子”的观点,但对问题的解决确有积极的作用。([5] 218~219 页) 青岛会议对遗传学领域的极端倾向有所纠正,成为落实“双百方针”的典型例子。([28] ,

① 1953年12月,毛泽东批评卫生部工作没有政治领导,“技术也管不好”([26] 205 页),强调“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26] 205 页)。1954年4月,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26] 236 页)。6月5日,毛泽东在同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了对中医不重视的不满,甚至说“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26] 245 页)。7月9日,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传达其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轻视中医是“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26] 258~259 页)。之后,大规模的对卫生部工作和轻视中医政策的批评随之而来。相关情况可参见参考文献[27]。

② 这方面的详情可参见参考文献[28]。

211~214页)

对乐天宇的批判是以文委的名义进行的,由当时的科学卫生处副处长赵汎主持。1952年4~6月,科学处和科学院对乐天宇进行了多次批判。其中在前两次会议上,批判的重点是乐天宇本身的严重错误,如“目无纪律,阴奉阳违,不执行党政策”、“严重宗派主义”等。([17], 591页)同时还形成了对乐的处分决议。相关情况虽被《宣传通讯》转载^[35],但传播范围仅局限于省、地、级领导;处分中提到了乐“严重地影响了米丘林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推广”,而并没有在米丘林和摩尔根学说中做出明确的态度。在第三次会议上,风向发生转变,乐天宇本身的问题不再是重点所在,支持和发展哪种遗传学成为会议的主题。孟庆哲、何祚庥等人撰写的《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一文被作为对乐天宇批判的结论由科学处副处长赵汎向与会者宣读,以鲜明的态度支持米丘林遗传学、批判摩尔根遗传学。该文很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编者按指出,“关于目前生物科学的状况,特别是关于摩尔根主义对旧生物学、旧遗传学的影响,需要继续展开系统的批判。”^[36]^①受此文的影响,全国兴起了模仿苏联,打压消灭(摩尔根)遗传学的各种措施。1952年7月,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决定取消遗传学和育种学两门课程,转而设立“米丘林遗传育种与良种繁育学”([28], 179~182页)。为配合这次会议,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撰写了新中国成立后该组工作总结的报告,宣称“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召开以后,米丘林生物科学的理论与观点,将要贯穿到每一个生物学与农业科学的学科中。”报告半年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37],又一次强调了遗传学的研究方向。此次批判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阻碍了遗传学在新中国早期的发展。多年之后,科学处相关成员对这一事件进行了集体反思但各持不同认识。龚育之曾认为孟、何文章是“坚持米丘林方向”与反对“把米丘林生物科学变成枯燥的教条”的结合,前者是一种因袭,后者是从因袭中开始摆脱的转变。^[38]此观点得到了何祚庥的支持。李佩珊则认为,文章虽对乐天宇错误有所纠正,但在利用李森科主义来消灭遗传学、推动生物科学米丘林方向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28], 175~179页)龚育之之后也接受了李佩珊的观点。^[39]黄青禾与黄顺娥认为文章的发表实际上是“用了政治力量来支持米丘林派、压制摩尔根派。”([12], 74~75页)黄青禾认为此文的影响是科学处一件比较争议的事情,当事人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12], 74~75页)。

对梁思成的批判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主持,彭真采取了一种相对灵活的办法,他组织相关人士集中撰写批梁文章,成文后交由梁思成本人以其施加压力并承认错误。([7], 27—28页)此举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梁思成在压力之下作了检讨。科学处成员何祚庥参与了此次批判,他的文章在《学习》杂志上刊载,文中将梁思成的建筑思想上纲为“直接违反总路线的错误理论”、“违反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错误”,梁的思想付诸实践会导致“建筑材料和劳动力的巨大浪费”。^[40]在高层的主导下,对梁的批判并未

① 赵汎、孟庆哲、何祚庥等人是以政务院文委的身份参会。

扩大化^①,何文没有产生类似在乐天宇事件中的影响。何祚麻表示他是在彭真的指示下才发表文章,而梁是看到文章后才做出自我批评。([16] 75~77页)于光远则说是何本人将文章送到《学习》杂志,梁的认错与此无关。([7] 27页)^②两人说法明显不同,唯一确定的是何文成为当时唯一公开发表的文章。从文本来看,何文与《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论调类似,政治批判的气味浓厚。梁积极认错的态度、特殊的身份、高层刻意的保护,使得对梁的批判没有产生严重的后果。^③

批判乐天宇错误时为何突然转向尚需进一步的研究,黄青禾质疑孟庆哲、何祚麻等当事人回避了这一历史问题;而关于对梁思成批判文章的发表,于光远和何祚麻的说法也存在出入,种种都暗示了科学处处理这些事件时存在某种个人因素。在乐天宇事件中,高层关注的是如何解决负面的政治影响,对遗传学本身的发展并无特别要求,科学处的态度导致了事件的走向;在梁思成的例子中,科学家的学术思想和高层政治需求发生了冲突,后者很快达到目的,加之科学家本人的特殊地位和高层的直接主导,使之成为受控的批判,科学处成员的文章并未产生影响。两个事件表明科学处成员在如何准确认识、判断、平衡学术批判和政治需求之间张力方面存在着差异;政治需求的不同导致了事件迥异的结果。

科学处所参与的这些涉及知识分子政策的事件,有的是因高层政治对科学领域存在问题的纠偏而产生,有的则是高层政治直接介入科学研究领域产生。前者高层政治的关注点在于焦点问题的解决,对科学事务的发展并无直接干预,科学处的工作反而对事件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青岛遗传学会议和乐天宇事件即提供了效果正反的两个例子。后者因政治与科学的直接冲突,由高层领导人直接主导而产生,科学处的行为也被置于其控制之下。而在体现国家意志的科学政策事件中,科学处是协同相关部门发挥作用。在这几类事件中,只有在解决科学领域存在的问题的事件中,科学处才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正是这种权力可能导致科学发展的不同走向。

4 结 论

在相关的口述回忆中,科学处成员认为以1956年为界,前期科学处在处理科学领域事务、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等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后期的重要性则明显下降,转为配合国家科委等部门发挥作用。这一判断可以直观地从科学处成员所参与的历史事件中看出,以时间段来看,这些重要事件主要集中于1956年之前。作为中宣部的一个职能机构,科学处也参与了当时的自然科学批判等带有浓郁意识形态色彩的工作,但更重要的是科学处

^① 1955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如何进行建筑思想批判的通知》^[41]强调“梁思成在建筑学方面的错误,是属于人民统一战线内部人士的一种学术思想方面的错误”,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错误并不是孤立。并就如何有限度地批判提出了明确要求,不再对梁思成本人点名批判。

^② 陈徒手在《一九五五年险境中的梁思成》(《南方周末》2013年5月14日)中提到刘小石的口述,当时是由建工部出面向梁思成展示一组批判文章的小样,梁思成看后作出了检讨。

^③ 对梁思成的批判正值中央酝酿知识分子政策调整之时,1955年12月12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草案提到关于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应将其视为反革命分子对待。毛还特别加上了“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对梁思成的处理可能也同这种政策的调整相关。

作为中宣部的终端权力履行领导科学工作的职能。大体上可以将科学处这方面的工作分为两类:日常状态的对科学领域(集中体现在与科学院的关系上)的管理“非常”情况下参与重大科学事件,它在微观和宏观两个不同维度上都发挥了作用。微观方面科学处提供的是一种领导力和整合力,为政权更迭之后科学工作的有序开展和新科学体制的建立提供了一些保障。宏观方面科学处的工作更多是服务于国家意志,并受高层政治的控制,但在矛盾尖锐、与政治无直接冲突的科学领域,它仍然独立的发挥了某些作用,并对相关领域以及科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代表科学界在会议上作了口头发言,这既说明了科学处在科学领导工作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也是对它之前工作的政治褒奖。

参 考 文 献

- 1 郑丹.在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宣部科学处(1951—1966)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09.
- 2 樊洪业.《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的来龙去脉[J].中国科技史料,2000(4).
- 3 樊洪业,等.黄宗甄访谈录[J].中国科技史料,2000(4).
- 4 荒坪.我的外公陆定一[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311.
- 5 龚育之.回忆中宣部科学处[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3).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M].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505.
- 7 李真真.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同志访谈录[J].院史资料与研究,1994(1).
- 8 李真真.何祚庥先生访谈录——在科学院和中宣部科学处之间[J].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1).
- 9 熊卫民.在科学和宣传之间——何祚庥院士访谈录[J].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1).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M].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363.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M].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252~254.
- 12 张黎,郑丹.我们在中宣部科学处:黄青禾、黄舜娥先生访谈录[J].科学文化评论,2009(4).
- 13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编).薛攀皋文集[A].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与资料丛刊[R].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2008.1.
- 14 国务院关于设立、调整中央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有关事项的通知[A].国务院法制办(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Z].北京:法律出版社,1956.151~153.
- 15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编).宋振能文集[A].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与资料丛刊[R].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2006.40.
- 16 何祚庥.关于《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的校正与补充》[J].院史资料与研究,1994(3).
- 17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Z].第12卷.樊洪业(主编).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 18 李真真.龚育之同志访谈录[J].院史资料与研究,1995(1).
- 19 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
- 20 熊卫民.何祚庥院士访谈录[Z].院史资料与研究,2014(4).
- 21 张稼夫.我与中国科学院[J].科学新闻,1999(13):22.
- 22 葛能全(编).钱三强年谱长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98~199.
- 23 龚育之.我与自然辩证法不解的缘[A].龚育之自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63~64.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M].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433~434.
- 25 王斌.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J].东北卫生,1950(9).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M].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27 吕嘉戈.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58~160.

- 28 李佩珊. 科学战胜反科学: 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及李森科主义在中国[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 29 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244.
- 30 龚育之, 刘武生.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提出[N]. 光明日报, 1986-05-21.
- 31 中共中央宣传部. 批判几种违背团结新旧医政策的错误言论[J]. 宣传通讯, 1954 (6): 20.
- 32 何祚庥, 胡乔木同志与自然科学研究[A]. 刘中海, 等(编). 回忆胡乔木[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171.
- 33 中共中央宣传部. 进一步深入批判医学和卫生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J]. 宣传通讯, 1955 (27): 27.
- 34 李佩珊, 等. 百家争鸣: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18~35.
- 35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国科学院支部大会对于乐天宇同志所犯错误及对其处分的决议[J]. 宣传通讯, 1952 (14): 25~31.
- 36 何祚庥, 等. 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J]. 人民日报, 1952-06-29.
- 37 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 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 肃清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影响——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三年来的工作总结[N]. 人民日报, 1952-12-26.
- 38 龚育之. 科学·哲学·社会[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7. 339.
- 39 龚育之. 龚育之回忆之“阎王殿”旧事[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 279.
- 40 何祚庥. 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J]. 学习, 1955 (10).
- 41 中央关于如何进行建筑思想批判的通知[J]. 宣传通讯, 1955 (31).

The Science Department and Science Leadershi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51 to 1956

ZHANG Li ,

(College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049 , China)

ZHAO Tao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190 , China)

Abstract The Science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1951 ~ 1966) was an institution responsible for affair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 and had wide influence on science leadership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1 ~ 1956) . The Science Department was established as part of the increasing power and expansion of the management scope of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 with the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f scientific work. Owing to the background of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 the Science Department took on a routine leadership function for scientific work , such as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t was thus a very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the science field. In addition , the Science Department participated in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which related science policy and policy regarding intellectuals , having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some such events. Study of the Science Department helps us to understand how the Party directed science work ,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 after 1949.

Key words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 Science Department ,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science leadership work , Yu Guangyuan , Gong Yuzhi